

近代史研究

JINDAISHI
YANJIU

1988 3

《平黔纪略》序

罗尔纲

一

太平天国失败后，各省多有编辑史书以纪其事者，如《平桂纪略》、《吴中平寇记》、《平浙纪略》、《山东军兴纪略》、《豫军纪略》等等，对今天研究太平天国史说来，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光绪初年，贵州议续修《贵州通志》，延贵阳人罗文彬、四川人王雪澄主其事，也编辑有《平黔纪略》一书。后因修志事停，这部《纪略》不曾刊行，罗文彬钞存有稿本。至1928年，议修《贵阳志》时，经主持人胡嵩在罗文彬后人家访得此稿，始得排印^①。

《平黔纪略》记事，起清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二十七日都匀府独山州斋教杨元保起义，迄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二月初六日苗民起义军李公鸡被俘牺牲，丹江一带都被清军占领为止，前后共二十年。

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各族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端绪纷繁，写这部史书，必须大纲在握，始能有条不紊。著者在《凡例》里说：

黔贼名目最夥，以苗、教为两大宗。仲与杠与保罗次之。叛

练、疆团又次之。粤贼则出没边隅，往来假道耳。

“粤贼”指石达开太平军。“教”，指斋教、绿教、黄白诸号，都“假神佛，托乩符，拜镪、圆光、颂经、食素”，用宗教来发

^① 据1928年11月胡嵩《平黔纪略序》。

动农民起义。著者抓着这个大纲，进行编辑，故能条理分明，记述贍详。

著者处理史事，博考参证，其态度也还严谨。他在《凡例》里说：

设局官修之书，非同私家纪载，自以奏折为凭，取备他日国史、方略采择，庶归一致，以免差歧。……故创稿之初，先为长编，即二十年奏报括取无遗。其不具者，乃沂之稟报。又由本人稟报，参考他稟报，以及邻省咨移，州县采访。比附证校，折衷一是。不执成见，不主一说。间有大异者，即两存之。

他以奏折为凭。遇到奏折有不详悉的，就去查原来的稟报，还要参考其他人的稟报，以及邻省咨移，州县采访，将这些材料，一一对勘证校，以求得详备正确的事实。这是著者的博考参证。他不执成见，不主一说，遇到大不同的地方，就两者并存，这是他的严谨。尤其是所据的奏折、稟报，咨移、采访等档案，当“辛亥改革之初，官案已毁”^①，稽考无从，赖有此书得以保存下来。此书所以值得我们重视，就在于这些地方。

著者虽站在官修史的职守，但他还没有完全抹煞历史事实。书中记有李文彩之死。李文彩是太平天国时期一位杰出的壮族革命英雄，转战西南，而在贵州战斗最久。他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广西横州率领壮族贫农起义。太平天国庚申十年（1860）九月战败，从桂北怀远县梅寨入贵州。后在贵州加入石达开远征军。癸开十三年（1863年），石达开在大渡河军覆。这年九月文彩回军贵州黎平府，屡破清军，与苗民起义军余老科、罗光明，斋教起义军胡胜聪，黄号起义军何得胜等联合。清廷得奏，下谕命云、贵、广西督抚“务当合三省兵力，殄此巨患，肃清边陲。”从此与清军连年在贵州境内战斗。辛未年（1871年）春战败。八月，向北转移，据凯里太平堡，与张秀眉领导的苗民

① 据1928年贵阳修志局修志时，纂修王蔬农、袁尊吾所说，见胡嵩《平黔纪略序》。

起义军取得联络，彼此依护。壬申年（1872年）三月，清军诸道并进，文彩与张秀眉等浴血抗击，营垒被攻破，各夺路退走。四月，张秀眉被俘，清军也以文彩已被杀毙报闻。据当时人指出，李文彩并没有战死，他还生存，清军的报告是假的。对这件历史事实，著者除了在卷十九，清同治十一年四月记事里，以传疑之笔记此事道：

夏四月初一日，李文彩、李高脚……败走。……初三日，宇文秀、李得贵及之金棚，沿途追败之龙洞。……贼犹有众数千，走入思、镇间牛塘。初六日，秀、得贵追至，围而聚歼之。以检积尸始知李文彩、李高脚皆死乱军中告，梟首送周达武营。

他在《凡例》里，却把事实真相告诉了读者，说：

贼渠死亡，自古率多疑案。军中偶胜，或夺某巢，辄报贼首某死乱军中。又有获非其人，而指鹿为马，如《晋史》之孙歆，《宋史》所称依智高之类。今奏报中即明称军前正法，如包茅仙、陈乔生等，旋又获之。又若李文彩、王超凡，犹有能指其尚在者，皆其类也。

这条《凡例》，不但告诉读者李文彩没有被杀死，而尤其重要的是告诉读者官军奏报一向是多虚报的。关于官书多伪，我在拙著中，曾经多次考证过。现在，竟由这个编辑《平黔纪略》的罗文彬，以官修史的编纂者的身份向读者暴露出来了！

二

我撰著《太平天国史》，其中《张秀眉传》和《李文彩传》主要根据都取自《平黔纪略》。久拟把它重印。只因错字很多，整理不易，没有时间去。几年前，遇见贵州师范大学校长吴雁南同志，向他建议请贵州学者担任，整理此书出版。他慨然应允，说：“我们一定整理好。”不久，贵州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梁燕同志来京，我又向他说到这部资料的重要，希望把它印行。梁燕同志说：“只要整理好，我们立即付印。”前几天接到吴雁南同志来信，说：“《平黔纪略》一书，已由贵州大学杜文铎等同

志标点，并得到梁燕同志支持，列入贵州人民出版社计划。”叫我写篇序言。同时，接到梁燕同志来信说，此书即将付印，望速将序言寄去。我希望印此书，已经三十年，整理和出版都不是易事。今天，得到吴雁南同志和梁燕同志的鼎力主持，杜文铎教授等同志的艰苦整理，使此重要史料得以出版，以供广大研究者的应用，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谨在这里向各位同志致以敬意！

这部书的出版，还有一个大意义。说来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有一次，在重庆召开有关太平天国史的会议。吴雁南同志提出一个建议，说现在太平天国史研究，都注重在东南，西南方面还是空白。他主张对西南方面的太平天国史事，多搜集，多研究，多出版。我十分赞同吴雁南同志这个卓越的建议。因为，金田起义，天王洪秀全在广西武宣东乡登极，消息传到贵州东南部，立刻到处洋溢着一片：“太平王登基改元”^①的欢呼。于是西南地区各民族就纷纷起来响应。其后石达开远征，李文彩回军贵州，又与西南各民族并肩作战。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西南地区各民族起义斗争，乃是太平天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太平天国史必须研究它，研究西南各民族历史也必须研究它。但是，我们过去对这一方面的资料搜集少，研究少，出版少，确实是一件缺陷。今得吴雁南同志登高一呼，为之提倡，又得贵州人民出版社梁燕同志大力支持，开广印西南民族斗争史的风气，这又是一件可喜的事。兹当此书发刊之际，谨把这两件可喜的事敬告于读者之前。

（责任编辑：谢维）

〔作者罗尔纲，190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① 据胡林翼咸丰三年《陈明黄平事竣并厘定粮章启》，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十六《宣黔书牍》。

马沙利与上海海关

梁 侃

上海海关，即江海关。1854年，上海海关为英美法三国接管，成为外国控制中国关税机构之滥觞。上海海关事件为近代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然而，认真考察该事件的起源，尤其是从当时在华列强相互关系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外国控制海关并非不可避免。其所以终于演成事实，清廷官吏缺乏近代外交思想，盲目排外，腐败迂阔，实为重要原因。

(一)

在小刀会占领上海之前仅仅两个月，1853年7月，美国驻华公使汉弗莱·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鉴于中国国内阶级冲突的局势以及在华列强的相互矛盾，提出了美国应该支持清朝政府，干涉太平天国的政策主张。他说：“我的意见是，美国的最高利益是卷入支持中国之中——维持此间的正常的秩序，并逐渐地向陈腐的肌体中灌输健康的因素，使这个政府（指清政府——本文引者）得到新的生命。不能坐视中国变成为无政府状态蔓延的场所，最终成为欧洲人的野心的牺牲品。”^①

马沙利在上海关税问题上的做法，是其支持清政府主张的

① 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 (以下简称USC, I)第4卷第29号。

集中表现。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不妨对英美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做法，作一比较。

1853年3月，太平军进逼南京，震动上海。地主商人无心经营，拒付白银，外商无法结关返航，向英国领事阿礼国提出申诉。阿礼国遂将外商们的申诉提交吴健彰，并建议一项临时办法，由道台凭领事对将来补缴各项税款的担保，发给出口准单^①。实际上，这一临时办法仅仅要求商人向领事馆交付期票即可结关，这种期票最终是否兑现，将由英国政府决定。这就清楚不过地暗示：只要英国政府批准，所有期票都将是空头支票，正如一年以后的事实那样^②。英国政府对期票的最后处理，与阿礼国起初在通告中对中国政府冠冕堂皇的许愿形成鲜明对照。从中国人不难窥见阿礼国率先倡议实行“领事代征制”的最初动机——正如历史家们已经指出的，是在履行条约义务的幌子下掠夺中国关税、抵制中国在内地重新设关的手段^③。

与英国不同，马沙利希望“谨慎地履行”美国的条约义务，规定付税必须以现银支付。这表面上是支付形式的不同，实际则体现出马沙利的不同立场。尽管他多次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是表示美国履行条约，以便今后向中国政府索取赔偿。但是，即使支付期票，也并不妨碍他的索赔要求——因为从名义上说都是对条约的恪守。

这样，在中国的外国船只在支付关税的问题上，就呈现出三种情况：美国以现金支付；英国以期票支付；其他国家借口没有中国海关机构干脆不付。因此，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美国的商人和船主自然陷入严重的劣势之中。唯利是图的商人并不了解和欣赏外交家的策略，在沪美国商人很快起来反对。9月20日，金

① North China Herald, 1853年3月12日。

② 英国外交部后来命令，所有期票都退回商人。见J·K·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第1卷第420页。

③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3~114页。

史密 (Smith King & Co.) 等四家商行联名写信给马沙利, 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并坚持认为, 上海的贸易将由于清朝政府的废止而受到损失, 上海应被作为一个自由港。他们向公使提出了责问: “我们知道, 按税率支付关税, 是我们同中国贸易所承诺的一个条件, 关税是条约的一个部分; 但是, 条约同时不是也规定皇帝对我们有‘时加保护’的义务吗? 目前的保护在哪里呢? 如果中国人——不管是有意无意——不能履行他们的条约部分, 为什么我们非要履行我们的这部分呢?”^① 商人们的不满和愤慨, 丝毫没有动摇马沙利的决定。他答复道: “条约没有废止, ……双方对条约的义务并没有因为上海被那些群氓占领而消亡, ……你们坚称你们现在没有任何保护, 但是我并未听说你们受到攻击、你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侵犯, 或者你们的财产遭到不法之徒的抢劫。”^② 结论是: 按规定交纳关税。对商人们提出的也以期票作为支付手段的请求, 马沙利未加理睬。

经过这场风波之后, 临时制度就以这种情形维持下去。但它仅仅对美国商人有约束力, 对清朝政府的财政支持也极为有限。惟有扶持和恢复清朝的海关机构, 才能迫使外国商人纳税。于是, 当清政府试图在上海重建海关时, 马沙利积极支持之, 而不惜与英法等国站在对立的立场。

1853年10月10日 (咸丰三年九月七日), 上海兵备道及海关监督吴健彰发布一则重新整顿海关的通告, 宣布“关税征收事宜仍按旧例办理。”^③

吴健彰想以一则通告收复海关, 立刻遭到英国的抵制。不仅如此, 阿礼国对于中国方面要求英国交还所欠关税银两, 也拒不认帐。并威胁清政府, 如果清方直接向中国商人征税, “则我国政府必在其他方面实行报复。在当前的严重情况下, 势将对贵国利益大有损害”。声称英国可能“不得不放弃中立政策, 而采取

①② USC, I, 第4卷第117、113号。

③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 第319—320页。

自卫办法。”①

正当吴健彰受到英国抵制、一筹莫展之时，美国公使接连给他以支持，鼓励他重建海关。10月24日，马沙利训令金能亨向美国侨民发布通告，宣布“承认他（指吴健彰——本文引者）有权向美国船只征收关税。”甚至在尚未弄清中国海关税收人员的办公地址的情况下，美国就单方面宣布“临时规则于二十八日上午起失去效力。”②与此同时，美国副领事金能亨写信给吴健彰，鼓励、催促他重建海关。信中说：“我前次有信给你，请你说明你的税务员将在何处征收关税，但至今还没有收到你的回音。”

“你当然知道，我得到美国公使阁下的许可而拟订的临时规则，不过是应付一时的紧急事变；除在短时期内让贵国官员重新建立海关，并有足够力量来执行业务，因此不致产生中断危险之外，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把美国的官员当作贵国的长期收税员。……为了便利你作复并相信你会指定办理纳税事宜的地点起见，我特地将宣告废除上项规则的日期，延期三天。”③尽管这封信给吴健彰增添了勇气和胆量，但考虑到英国的态度，吴健彰仍忧心忡忡，10月26日，他写了一封信给金能亨，说他还不准备恢复其职责，请求临时征税制度再延长一个短时期。美国外交官拒绝了他的请求④。10月28日，即原定废除临时制度之日，金能亨发出通告，说他已接到吴健彰的通知，中国海关人员“将暂在停泊于租界对岸的两艘中国军舰上办公，该军舰并将悬挂海关旗帜。”⑤要求美国人到中国海关纳税。

美国外交官的这种做法，激起了商人们的无比愤怒。为了使马沙利难堪并收回成命，奥古斯汀（Augustine Heard & Co.）

①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第326页。

② 同上书，330页。

③ 同上，第331～332页。

④ 见L·A·Schneiaer, Humphrey Marshall, A Commissioner to China, 载Kentucky Historical Society Register LXIII (April 1965)。

⑤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32页。

等四家洋行决定投书在沪各国领事，询问他们对海关的态度，以此向本国外交官施加压力^①。对此，所有的领事都复了函，所有复函对于是否承认海关的回答都是否定的^②。法国领事爱棠（Edan）更是声称：“我国商船可以免税自由进出。”^③

马沙利在外交使团中非常孤立。在沪美商收到这些复函后，觉得更有凭恃。于是于10月31日向金能亨递交了一封抗议书，并立即将该书公布在《北华捷报》上。抗议书指出：“贵领事可以看到他们一律做了否定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美国船只也应放在同样的地位，这样说，不会是没有理由的。……对于你承认一个水上流动海关，也就是随时可能被赶跑的海关，我们和我们的同行认为这是严重危害美国利益的行为。我们不得不对此提出严重的抗议。”^④马沙利接到商人抗议书以后，坚持他的既定计划。他说：“请你转达那些公民，我对他们的请求很难照办。在你转来的信内关于我执行任务所采取的办法，我没有看到任何具有新意义的理由，足以使我改变政策。”这位公使无视美国商人在此种竞争中一定吃亏的事实，声称：“不论什么时期，只要美国货运实际上遭受上海中国当局的歧视待遇，根据条约规定，我们能立即采取各种补救办法，不致使美国货运的利益蒙受损失；这正是我的职责所在而无疑的。”^⑤马沙利坚持自己的主张，直到他本人发觉这一做法并不能给他带来好处为止。

（二）

马沙利的政策主张，尽管其最终目的是维护和发展美国在华利益，但清朝政府作为此项政策的支持对象，毕竟是马沙利设计

① 该信全文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33页。

② 当时驻华领事中，除阿礼国一人外，都由商人担任。而且大国的商人常常担任别国的领事，如葡萄牙领事兼荷兰副领事比尔（T·E·Beale）是英国邓特商行（Dent & Co.）的负责人之一；而汉堡领事汉格（W.Hogg）也是在华最重要英商之一。因此，这些领事的答复，必然与英国一致。

③④⑤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34，337，339页。

方案的直接受惠者。然而清朝统治者并不欣赏马沙利的做法，这是其计划受挫的重要原因。

清朝统治者为什么会拒绝洋人的支持？这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清朝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封闭江浙闽海关，限制对外贸易，近二百年中一再颁布规章，限制外国人和中国人通商和其他往来，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闭关政策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和外国隔绝。因为满族原是中国北方的一个人口很少的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很担心汉族人民和外国人相结合反抗清朝统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往来，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①清政府自己也承认：“向定章程，俾民夷不相交结。”^②虽然经过了鸦片战争的打击，清朝统治者并未摒弃排外政策。十九岁的咸丰皇帝刚继位，就遇上十九世纪世界最大起义的爆发。因此，咸丰和他已经领教过外国船坚炮利的大臣们，对于在华列强的一举一动，充满着警惕、疑虑和恐惧。

清廷对列强的疑惧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担心列强利用中国内战局势要挟清政府。1853年4月16日叶名琛向清廷报告说：“据密探禀称：该国王（指美国）因道光二十一年间定条约时，曾许给有十二年后再行更易之议，本年正计届期，亦难保其不乘此内地匪扰兵分之际，从旁窥伺，别有要求。”^③咸丰批示该督“密为筹度，以备不虞。”

第二是担心外国同太平天国结合起来打击清王朝，认为太平军与西方各国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很可能因此“勾结”。叶名琛奏道：“臣等查此次逆匪本系起于天主教，而天主教流毒中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7页。

② 两广总督李鸿宾奏，《史料旬刊》第九期。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册，第201页。

为日已久，为害不可胜言。自道光二十五年因佛兰西准其在通商之五口传教建堂，由是内地患民辗转传播，明目张胆，会党肆无忌惮。此次文翰竟敢直入江宁城内，与各逆相见，若仅为自保货物免遭劫掠，情尚可原。倘再因其习教引为同类之人，暗相勾结，尤为可虑。”^①一些外国商人为了赚钱，暗地向太平军出售军火，为清军截获。特别是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后，外国人与起义军的联系无可防范，咸丰更为惊慌，指示怡良等人说：“上海为海口通商重地，必须设法控制各夷，不令与逆匪勾结，方可将城中麇聚匪徒四面兜围，断其接应。”^②“明攻逆匪，暗防外夷”，就是咸丰此时处理内忧外患的政策。在这种情形下，马沙利想与清政府拉关系，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咸丰政策最得力的贯彻者是负责“办理夷务”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马沙利北赴上海后，叶名琛担心马沙利与太平军联络。就在马沙利决定支持清王朝，并伺机贯彻其政策的8、9月间，叶名琛接连上奏，要求饬令马沙利立即返粤。在9月1日的奏章中，叶名琛写道：“该酋（指马沙利——本文引者）前往上海，亦只为护货而行，并无他意。惟至上海后，因江南有向该夷借雇火轮船之说，遂觉中国转倚外国为御侮，未免从而生心。……惟查该酋仍驻上海，现在是何情形，无从遥制，更恐相处日久，奸民因而怂恿，匪徒与之勾结，其事均未可定。”这番话，使咸丰顿时警觉起来，感到“现在该酋久处上海，难保无奸民怂恿，匪徒勾结情弊”，立即命令怡良“饬令吴健彰，谕令该酋速行回粤。”^③就是说，当马沙利在上海伺机帮助清政府的时候，咸丰帝则下旨促令其南返广州。

11月初，马沙利在强令美国商人向吴健彰纳税之后，搭乘英轮南返，寻求同叶名琛的再次接触，于11月8日到达香港。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47/631号，一档馆藏。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期，第一册，第234页。

③ 同上书，第222—224页。

马沙利南下的目的，是想同两广总督叶名琛会谈，共同制定一些办法，使其他国家在海关关税问题上，也同美国一样。他在致国务卿的信中说，他到广州是“希望有便利同他（指叶名琛——本文引者）讨论在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奇怪理由下挑起的那些问题。”^①

马沙利到达香港当日，即由伯驾致函叶名琛，请求早日会晤。半个月后，叶名琛未加理睬。马沙利便照会叶名琛，说：

“钦差肯定知道，在上海陷落之时，本公使即着领事指示本国各商民等，有船出口者，俱写乐从单保，及中国税项银两照依条约章程，迨后海关监督复回在案之时，遂着该领事除去先时暂立之例，让本国商人在关口自为完税。”^②照会叙述了在沪别国未能象美国一样以现银完税的情形后提出：“所以欲与大人面会相商，着实议定，然后飭令示谕，俾各商民贸易得以划一也。”^③叶名琛虽然极力催促马沙利回广州，但在马沙利南返后，他仍奉行“回避不见免生枝节”的原则，在接到马沙利照会后，仍然装聋作哑，说照会所言，“粤省并无此事，似系专指上海而言，应咨查江南方能悉其原委。”^④并以“军务甚忙”为由，拒绝会晤。

叶名琛的态度，令马沙利十分惊讶。他随即又给叶名琛发了一份长篇照会。该照会包含如下内容：首先，反复强调在上海海关问题上，唯有美国是帮助清政府的，“现在上海肯照常输税者，惟一合众国。”其次，抱怨美国如此帮助中国，结果“反受其累”。最后，马沙利指出，如果清朝方面仍然无动于衷，美国也将改变其政策，而不能坐视自己利益遭受损失。照会说：“倘使中国政府不能坚持，那么任何义务都将不复存在。……在贵爵大臣完妥办理，或能暂免收税，或有别法得除不平之弊，因系害本国贸易，若准本国船照各国一样擅便出口，此系条约所应得，

① USC, I, 第4卷, 第88号。

②③ 《中美关系史料》，第140～141页。据英文原件，译文略有修改。

④ 《中美关系史料》，第141页。

不欲本国有一妄求。”^①

到这个时候，马沙利确实已作好两手准备。上述照会发出后两天，马沙利函致金能亨，暗示他将改变政策^②。可是叶名琛始终坚持咸丰“万不能示之以柔，露有羈縻之形，适足启该夷之要求”^③的指示，仍以三言两语敷衍推诿。马沙利遂于12月31日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中国能要求并迫使在沪所有各国迅速纳税，美国当局则必定致力约束美国公民，依照条约精神纳税。反之，如果别国船舶能进出上海而不纳关税，或不纳现银，仅以一纸最终是否兑现不在中国定义的期票，美国也将据此作为中国朝廷打算同意各国上述行为的充分证据。……美国领事将行使保护美国公民的权利，无论港口结关证明即可发还船牌，美国公民在上述情形下，也无须交纳任何进出口关税。”^④马沙利强调，“美国不要求得到比最惠国国家更多的特权，但也决不能更少。”^⑤叶名琛对此毫无反应。四天后，即1854年1月4日，马沙利便命令金能亨“停止纳税，在所有方面，将上海视为一个自由港。”^⑥

至此，作为支持清王朝政策重要内容的关税政策发生了变化。

马沙利作法的变化，是他在南返广州与叶名琛再度接触后发生的。可以肯定，至少在马沙利到达广州时，他还没有料到会改变方针。在11月21日致国务卿的信上，马沙利仍把“变上海为自由港，”看成是在沪外商和阿礼国领事的“非份之想”^⑦。而其作法在不到两月的短短时间内，即发生一百八十度的急转，显然是由于奕訢、叶名琛之辈“明攻逆匪、暗防外夷”的策略方

① 马沙利致叶名琛照会，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见《中美关系史料》第142～145页。据英文原件，译文略有修改。

② USC, I, 第4卷第134号。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册，第265页。

④⑤⑥ USC, I, 第4卷，第140号、142号。

⑦ USC, I, 第4卷，第88号。

针的结果。

•

•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简短结论：在上海海关瘫痪时期，美国外交官执行了维护清廷的策略，而与英国等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如果清朝统治者稍具近代外交观念，能利用列强之间的相互矛盾，那么，维护本国主权和利益，并不困难。然而，以叶名琛为典型代表的清朝官吏，愚昧顽固，盲目排外，终于坐失良机，导致1854年三国共管海关。资本主义的外力侵略，总是要依靠中国的内部因素才能实现，清廷的腐败愚顽，是外国得以控制中国海关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谢维）

〔作者梁侃，1955年生，南京大学留学生部讲师〕

试论甲午战争期间沙俄对 日本的基本态度

刘 恩 格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沙皇俄国对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态度如何？近年来，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认为沙皇俄国采取了“纵容”、“不干涉”乃至“支持”的政策^①。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看法，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

米庆余的文章认为沙皇俄国对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采取“纵容”、“不干涉”和“支持”政策的理由有二：一是战前，俄国自始至终“赞成”和“满意”日本的各项侵略行动，特别是出兵朝鲜的举动；二是战中不仅不积极进行干涉，反而竭力支持日本的军事行动和对中国的讹诈。上述理由的主要史料根据是《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十七卷一、二册中有关内容。然而，如果全面准确地去理解和引证上述史料的话，无疑会得出与米文相反的结论，即沙皇俄国对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战争所采取的政策不是“纵容”、“不干涉”和“支持”的政策，而是采取“抵制”、“干涉”乃至“反对”的政策。

战前，俄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自始至终“抵制”和“反

^① 见米庆余：《沙俄在甲午战争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王少普：《沙俄与中日甲午战争》，《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等文章。

对”日本出兵朝鲜。

1894年，朝鲜东学党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派兵朝鲜镇压农民起义；日本侵略者也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派重兵入侵朝鲜。日本政府为掩盖出兵朝鲜的真实目的和防备外国干涉，6月4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曾训令已在国内休假的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在向清国官员及驻汉城外国官员说明时，只讲保护使馆及侨民，此外“保证决无他意”。

日本出兵朝鲜的行径，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沙俄的高度警觉。8日晚，俄国驻朝鲜临时代理公使韦贝访问了日本驻朝鲜临时代理公使杉村濤，以质问的口吻“问及目前汉城形势已趋平静，而贵国政府欲派兵驻在是否妥当？”^①到6月10日止，日军7600人登陆仁川，4000名士兵已占领汉城。13日午后六时，当一营日军进驻汉城日本公使馆时，俄国临时代理公使立即至该馆，再次质问已归任的大鸟公使说：“据今所见，果如所闻，贵国到达数万兵丁究竟以何种目的而来者？据本官数日前自杉村濤临时代理公使处闻知，虽为护卫公使馆，但如阁下所见该地再无危险情形”。而且朝鲜外务督办已声明“匪徒败走，官军已入全州，事实已不必派入众多兵卒为好。”并建议日本“如稍有危险，可派朝鲜兵数十名护卫使馆。如尚感不足，使海军登陆亦足用”。认为日本派“陆军入京，并非稳妥”^②。大鸟为了掩人耳目，不得不按陆奥的指示告之：“我政府于护卫公使馆之外并无他意”。俄国代理公使“对此满意而归馆”^③。

从上述俄国代理公使对日本出兵朝鲜的两次质问中可以看出，俄国政府对日本派出少数士兵保护使馆并不反对；然而对日本在朝鲜“叛乱”平息后，又派重兵至朝鲜则表示抗议。这是俄国的基本态度。这一点连大鸟都十分清楚并感到事态不妙。就在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十七卷，第二册，第178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十七卷，第二册，第204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十七卷，第二册，第205页。